

中华传奇文物书系

青铜传奇

窦忠如◎著

Series of Chinese
Legendary Cultural Relics

Legend of
Bronzeware

揭示国宝传承的奇闻秘史
解密文物辗转的云谲波诡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Series of Chinese
Legendary Cultural Relics
Legend of
Bronzeware

中华传奇文物书系

青铜传奇

窦忠如◎著

揭示国宝传承的奇闻秘史
解密文物辗转的云谲波诡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铜传奇 / 窦忠如著.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2015. 6

(中华传奇文物书系)

ISBN 978-7-200-11227-6

I. ①青… II. ①窦… III. ①文物—青铜器—介绍—
中国 IV. ① K87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51388 号

中华传奇文物书系

青铜传奇

QINGTONG CHUANQI

窦忠如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 bph. com. 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5.5 印张 250 千字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0-11227-6

定价: 36.8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绪论

xulun

对于今人而言，青铜器似乎除了遥远就是冰冷，遥远是因为时间的缘故，冰冷则是由于材质的原因。我在两年前写作“中华国宝之谜”丛书（第一辑：《国宝传世之谜》《国宝消亡之谜》《国宝盗案之谜》《国宝流失之谜》《国宝回归之谜》五册，2011年1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之前也是这种表象的感觉，此后及如今集中时间和精力来写作“国宝档案——中华传奇文物书系”这套丛书的青铜卷时，一种温暖的感觉竟然从遥远与冰冷的时空奔涌而来，并逐渐注射进我开始沸腾的血液中，乃至最后竟蔓延了我的整个神经。于是，我选择在这个热血涌流的夜晚来写这则绪论，虽然自知对于中国青铜器的历史及鉴赏还不能够随心所欲地讲解与诠释，但是个人点滴识见与感悟还是想诉诸诸君。

其实，以手掌触摸青铜器的直接感觉，依旧是一丝冰凉慢慢地沁入心脾，这让我漫游的思想开始专注——5000年前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研究中国青铜器者不是没有选择，而是选择的余地需要进一步开拓，因为目前公认中国最古老的青铜器虽然是出土于马家窑文化遗址中的一件青铜刀，但是这件青铜刀很显然属于人工单范铸造而成，这就表明它绝对不是中国青铜器的肇始之器。故此，人们有理由期待中国更古老青铜器的

面世，更有责任（哪怕是无意间）协助考古者不断地推进中国青铜器的历史向前延伸。

不过，在更古老青铜器出现在研究者视野中之前，现在回溯中国 5000 年的青铜器历史，除了已为世人所认可的五大阶段——商代前期（二里岗期）、商代后期（殷墟期）、西周、春秋、战国的各自特征之外，探索其中细节特别是文化艺术细节，也许不失为当今青铜器研究者一个不错的选择。“细节决定成败”，是现今职场上比较流行的一句话，即使我一贯主张学者摸索学术细节是分内之责并不存在什么成与败的问题，但是不追究学术细节必败恐无疑处。具体到中国青铜器的研究，最初人们同样是从某些细节变化特别是规律性变化而提出以上五段划分法的，并由此才开始了比较有系统的学术研究活动。

以河南郑州二里岗出土器物为典型代表的商代前期青铜器，无论是器物的造型设计、纹饰雕镂、铸造工艺，还是器物的种类数量、组合方式、置放规制，都将商代“重酒组合”的礼器体制很好地体现了出来，因此说这是奠定中国青铜器第一个辉煌的成熟基础期。所谓礼器，就是古代贵族举行祭祀、宴飨、丧葬、婚冠、朝聘及征战等活动时所使用的礼仪性器物。而作为最能体现那个时代礼制的青铜礼器，又有“彝器”之谓，由于“彝”字在甲骨文与金文中都表示用双手捧着一只被绑住了两只翅膀的鸡敬献给神灵或祖先的一种形体，即便到了秦朝小篆中也不过是将向神灵或祖先敬献的鸡换成了彘头（猪头）与米、丝而已，这就从原始角度解释了彝器是由祭祀场景而衍生出来的器物之含义。

其实，“彝”字的本意是“奉献祭品”，后来才引申为彝器（即祭器或礼器），而彝器既然是一种礼仪性器物，东汉许慎就在《说文解字》中说：“彝，宗庙常器也。”也就是说，彝器既然是作为储存物品敬献神灵与祖先的礼器，就不应该随意更动它，但是早期商人不知何故不仅将祭祀食品更换成了以酒为主，而且彝器的性质外延也扩展了许多，难道他们的思想意识与前人相较已经发生了某种颠覆性变化？虽然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答案，但是并不妨碍人们揣想早期商人对容易让人产生幻觉的一种液体——酒充满了好感，否则

在以觚与爵为核心的“重酒组合”彝器中，为什么竟然将储存有食物的彝器挤逼得只好退居到角落里去了呢？

不过，无论如何彝器作为统治阶级非同凡响的身份、地位与财富之象征，在举行重大活动特别是祭祀场景中，往往被统治者有意无意地笼罩上一层神秘诡异的宗教巫术色彩，这种氛围想来是与统治者期望借此来满足他们祈福禳祸及愚昧民众的心理有关，否则彝器上那些变化怪异的纹饰为何也镌刻得摄人魂魄呢？

确实，关于商代前期青铜器的诸多特色，除了礼制上的“重酒组合”之外，就是器物上镌刻有以粗犷凌厉为美的神秘纹饰了，特别是那种给人狰狞感觉的饕餮纹的广泛应用，可以说已经毫无疑问地将早期商人的审美情趣展露无遗。至于人们一向看重的青铜器上之铭文，如果能够在这时候的青铜器上得以获见，那真是一件极为稀罕的事了，否则见多识广的现代考古专家们在这时期青铜器上哪怕发现了一二字铭文又怎能不兴奋得彻夜无眠呢？

确实，即便这一二字铭文书写的笔道不做后来书法艺术上所谓的波磔状，但是通过他们的考释还是泄露了数千年前先人们的某种信息，哪怕这一信息只告知人们他们原本属于哪个氏族，依然使一些后人将自己的族源推演得更加骄傲而辉煌。何况这些看似粗粝不甚精美的青铜礼器，不仅透露出早期商人比较娴熟的分铸工艺和比较先进的制范与合范技术，还由于它们大多出土于黄河流域及长江中游地区，这就为后人追溯自己的族源时提供了一条地域性引线。

与商代前期基本形成的这种“重酒组合”礼器体制一脉相承的，自然是商代中后期这种礼制的日臻完善乃至达到一种极致，哪怕最后这种礼制竟成为周人执政的诚勉信条，也不妨碍今人对中国青铜器第一个高峰到来的高声赞美。因此，在这里我们姑且不论商人是否是因为嗜酒而丧国，而愿意将1976年在河南安阳小屯发掘第二十三代商王武丁之王妃妇好墓中所出土多达460件青铜器作为一个典型例证，来解析商代“重酒组合”礼器的富丽华美与堂皇雍容。

的确，人们无法想象考古学家当时面对这一震撼世界重大发现的情景，

也无法想象贵为王妃的妇好是怎样惊人地嗜酒，哪怕她是一位冲锋陷阵驰骋疆场的剽悍女将，也不能使今人参透一冢之内以酒器觚与爵为轴心的礼器竟有210件之多，至于另外20多类礼器中还包括有鼎、彝、甗、簋、尊、罍、壶、缶、甬、觥、斚、盃、觚、盘、爵等，以及一些前所未见之重器与后世所知悉的青铜器几乎都悉数登场，传递给人们的只能是这时候的青铜器已经达到了成熟精美之程度。特别是作为食器——簋被列入礼器范畴，与乐器——铙的首次出现，同样指引人们产生这样一种足可信赖的认识——国人引以为傲的礼乐制度至少在商王武丁时代就已经初现雏形！

具体到这一时期青铜器本身之精美，可以从铸造工艺、器型种类、纹饰图案与铭文内容这4个方面来考究赏析。比如，虽然不是同时出土于殷墟妇好墓葬中，但是属于同一时期的中国迄今为止发现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鼎（2011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时改称为“后母戊鼎”），不仅体形恢宏、庄严凝重，而且铸造精良、纹饰华美，给观者一种典雅厚重的感觉，它无疑是商文化发展到巅峰时的一件产物。试想，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下商人竟然能够一次性（除了两只立耳是先铸成后嵌入鼎范中再铸之外）浑铸出这样一件大型、复杂、华美的青铜器，非有非凡气魄与精湛工艺是不能为的。

再比如，妇好墓出土460件青铜器中除了礼器外，还有250件属于武器、乐器、工具与杂器，特别是造型奇特的象生器的出现，不仅将商人构思巧妙的美学思想以动物形象的方式展示了出来，而且也将他们所信仰的精神世界及对神灵的向往揭示无遗，你看那些造型逼真的兕觥、象尊、羊尊、犀尊、虎尊、凤尊、牛尊、鸳鸯尊、猪尊、鸛尊等，哪一件的制作工艺不能用精湛绝妙来赞叹呢？

又比如，这时已经非常流行布满器身的纹饰图案，堪称丰富多彩、繁缛华美，不仅有几何纹样、象生纹样及怪异的动物纹样，还出现了地纹、主纹及在主纹上加饰花纹的重叠的三层花纹，有的纹饰图案不是左右对称就是成双成对，或者头尾相接形成一种有规律性的节奏感，至于浮雕与平雕相结合的雕饰手法的运用，更是将整个器物装扮得血肉丰满、耐人赏品。还比如，这时尚未脱离图形文字形态的青铜器铭文，虽然绝大多数只在器身上镌刻作

器者姓名、氏族或祭祀对象等寥寥几字，属于记事性的长篇铭文还较为少见，但是正是至今不过二三十件镌刻有记事性铭文青铜器的发现，还是无可争辩地解开了学者们皓首穷经而不能展开的某些历史愁眉。

梳理西周青铜器与商代大不相同的细节，首先应该有这样几个显著特征不能被淡忘或模糊：一是重食制度，二是列鼎制度，三是编钟制度，四是作器铸铭。关于西周青铜器“重食组合”礼制的形成，很显然是在打破商人“重酒组合”礼制上建立起来的，这从著名大盂鼎铭文中可以获证，因为这篇铭文与《尚书·酒诰》都将殷商覆灭的根由归咎于商人嗜酒所致，所以西周初年周公才颁布了禁酒令。既然如此，作为向神灵与祖先敬献祭品的青铜礼器，就绝对不能将盛酒与饮酒的酒器置放在主位，于是占据主位的开始由以鼎与簋为核心的“重食组合”礼器所替代。

作为最讲究礼乐制度的西周王朝，统治者在使用青铜器特别是在祭祀等礼仪性场合使用青铜器时，青铜器的种类选择、位置主次、数量多少都不能不有所规定，特别是“重食组合”礼器中的轴心器物——鼎与簋的数量自然要求得更加严格。关于这一点，今人完全可以从陕西宝鸡竹园沟西周早期墓葬中出土大小相次三具一组列鼎与另外两具配合鼎，以及商代晚期殷墟妇好墓出土两具方鼎、两具扁足方鼎及大小不同的32具圆鼎这两次重大考古发掘之现象，可知原本可能因为祭祀而创设的列鼎制度竟然还适用于丧葬形式。至于史书中留下“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二簋”的文字记载，更是为西周这种列鼎就食制度提供了确凿例证。

非常具有情调的是，西周贵族在列鼎就食时往往钟乐齐鸣，且打击编钟的数量也要与宴飨的规模档次相匹配，这就是所谓的“编钟制度”。

与商代青铜器鲜少铭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周贵族在作器时最盛行铸铭，特别是长篇铭文更是将铭文记事性的特点披露无疑。比如，铸有499字长篇铭文的西周毛公鼎，惊献给人们的不仅是人世间最早最美的一篇庙堂典章，而且世人还将其与一篇《尚书》相媲美。

再比如，铸有357字长篇铭文的西周散氏盘，贡献给世人的就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份外交和约。又比如，刻有284字长篇铭文的西周共王时代的史

墙盘，记录的无疑是那个久远时代微氏家族辉煌历史的全景式叙事诗。这些长篇铭文的出现，既更正了史籍中的诸多舛误和世人揣测，又填充了传世典章中不应该留存的谜阙，何况单从中国书法艺术史角度与价值而言，它还衔接了犹如天书般的甲骨文，并开启了至今还在使用的篆、隶、楷之端绪呢！

当然，除了以上从制度层面解析西周青铜器与商代之迥异外，还不应该忽略青铜器本身的细节变化。遗憾的是，西周青铜器无论是在器型还是纹饰上，虽然全面有效地继承了商人衣钵，但是继承传统本是为了更好地创新和发展，而艺术发展所需要的创新精神在西周人那里却显得较为保守。因此，西周青铜器虽然在纹饰上有所变化，比如商代最流行的饕餮纹逐渐被夔龙纹及云雷纹所取代，还新增了长鸟纹、窃曲纹、瓦纹、重环纹、环带纹、双头兽纹等，可是这些新增纹饰逐渐陷入了定型化与程式化之窠臼，更别说体现商人那种恢宏气度的大型器物在西周人手中诞生或进展了。

恪守礼乐制度又缺乏创新精神的西周灭亡之后，随着王室东迁迎来了一个名为东周的新王朝，可事实上东周王朝则被切割成了春秋与战国两个阶段。也就是说，东周王室竭力以礼制维护大一统的古典世界，在春秋五霸武力撕扯下已经出现了不可弥补的裂痕，反映在原本体现王权与财富的青铜器上，就是王室之器在大幅度地减少，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各诸侯国之器则在逐渐增多，特别是实力强劲的各大诸侯国为了展示自己的王权特征，更是竭尽所能地在青铜器的造型与纹饰上进行巨大变革，从而形成了南方秀丽与北方雄浑这一南北竞秀的大好局面，这就是被世人广泛认可的中国青铜器第二个高峰。

具体到春秋青铜器在种类与造型方面的变革，最让人过目不忘的特点就是诸多器物都被添加上了一个盖，使整个器物形成了今天人们习以为常的模样。至于器型变化，酒器或者说水器——壶的变化最具有代表性，因为人们最常见的扁形壶已经出现了圆形、方形和匏形等许多变形，乃至有些壶变形得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却又合乎情理。

关于春秋青铜器在纹饰方面的创新，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一改商周青铜器纹饰那种神秘的宗教迷信色彩与繁缛风格，而是出现了一股极具地方特色与

清新感觉的新气象。比如，以两条或多条细小螭龙相互纠结缠绕在一起的蟠螭纹，不仅将器物装饰得纤细而华美，而且在与几何纹、贝叶纹、垂叶纹、绶索纹相配合运用时，更是具有了一种浓烈的生活趣味，哪怕有时候图案化倾向冲淡了原本的神秘，也不妨碍观赏者从中获得某种心理情感上的共鸣。

如果说春秋青铜器特别是中晚期已经进入到第二个辉煌阶段的话，那么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堪称名副其实的璀璨辉煌，乃至照耀得整个中国青铜器历史在世界上都显得熠熠生辉。

中国乃至世界文化艺术发展史上有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那就是动荡或分裂时期的文化艺术总是获得意想不到的丰富与发展，而大一统时间越久文化艺术则越是裹足不前，甚至干脆就僵死在绳墨规矩之束缚中。比如，战国时期青铜器就完全挣脱了西周礼制的牢笼，原本周人最讲究的礼器功用消失，器物原始的实用性开始彰显，特别是地域性特征更加鲜明，于是无论是北方晋秦还是东方齐鲁抑或南方荆楚都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别无一致的风格，这无疑使中国青铜艺术竞争得无比灿烂。

尤其是在青铜器的纹饰方面，不仅有以中华民族族源象征——龙为主题的细密形象纹饰，还出现了反映普通但又极具浓郁色彩的社会生活图案，诸如宴饮、乐舞、采桑、搜礼、渔猎、攻占等，这些纹饰图案的出现无疑向世人昭示了一个新的活跃时代的到来。至于构思奇特、铸造精妙的新器型的层出不穷，以及错金银、包金银、鎏金与线刻等新工艺的发明运用，更是为这一时期青铜器的辉煌增添了助燃剂。

接续春秋战国余晖的秦汉青铜器，虽然在工艺上追求更加精巧别致，但是崇尚实用与朴素已成时代特性，即便出土于秦始皇陵陪葬坑中的铜车马已经成为中国青铜工艺之绝响，也不妨碍甘肃武威雷台“马踏飞燕”与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及王妃窦绾崖墓中“长信宫灯”这代表两汉青铜科技水准的进一步提升。还有足以彰显边疆少数民族独特审美情趣与剽悍力道的青铜器具之发现，同样是中华民族久远辉煌青铜艺术开放在看似苦寒闭塞之地的朵朵奇葩，那种别样的奇异艺术芳香可以说是隽永不散。

当然，中国青铜艺术还在延续，是否还会出现新的喜人高峰，今人特别

是青铜从业者应该满怀期待并矢志创造，因为鉴赏与收藏青铜器等中华传统艺术品已经成为当前及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不能缺乏的文化营养，否则在巨变世界里迷失中华特性恐不是什么危言耸听的事。因此，如何鉴赏青铜器应该是下面文字所应承担的任务，至于任务完成到怎样一个程度，那就是笔者见识深浅之故了。

当然，青铜器学术研究特别是从文化艺术角度开展研究需要注重细节，鉴别欣赏青铜器更是不能忽视细节之异同，否则“打眼”将是一件无可避免的事儿。确实，鉴别一件距今千年以上的青铜器实在不那么容易，但是只要能够多观察实物、多牢记特点、多加以思考，从而掌握鉴别古代青铜器的一些要点，还是不难辨别其确凿年代与真伪的。比如，老古董商们在经营实践中经历了以上“三多”之后，便总结出通过眼看、手摸、耳闻、鼻嗅与舌舔这5道步骤，来对一件青铜器的锈色、手感、声响、花纹、款识、铜质与器型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从而准确判别出这件青铜器的真伪及所属年代乃至所属年代之早中晚期来。当然，作为不是古玩行内的青铜器普通爱好者（有关部门文物专家依靠先进科学仪器甚至是激光来准确测定者除外）来说，要想判别出一件青铜器之年代与真赝，有以下几种方法可以大有帮助。

一是，察看青铜器之锈色。据古玩行内人介绍，大凡流传至今的青铜器至少经历过入土、坠水与传世这三种途径之一，而“铜器坠水千年，则绿如瓜皮而莹润如玉；未及千年，虽有青绿而不莹；未入土水之传世铜器，其色紫褐而有朱砂斑，甚至其斑凸起”。就中国当今公私收藏的诸多青铜器而言，基本上都是古代窖藏或随葬之出土器物，又因各器铜质及各地土质、水质之差别，出土青铜器之锈色也是有所不同甚至大相径庭的，常见者有绿锈、红锈、蓝锈、紫锈，等等。

因此，当一件青铜器摆放在面前时，我们首先要察看其锈色与器体色泽是否深浅一致，如果锈色坚实匀净且莹润自然，则为自然生成之锈；如果锈色浮在器物表面且绿而不莹、色不润泽，还有一种刺眼感觉的话，那必然是作伪的表皮之锈了。接着，我们便可以先把双手搓热触摸器物后，再把手放在鼻子底下嗅一嗅，如果有一股铜腥味则表明是伪作之器，因为千年古铜是

没有铜腥味的；然后我们还可以用热碱水洗刷器物，这时伪作之铜锈便会往下脱落，如果伪作之锈没有脱落的话，再使用火烤则必然脱落无疑。此外，我们还可以用舌头舔舐器物表面，如果有一种盐卤的味道，则表明该铜锈必是伪作者。

二是，聆听感觉青铜器之声响轻重。用手敲击器物如果发出一种细微清脆之声响，则表明这是一件真正的古代青铜器；如果声响浑浊发出“嗡嗡”之音，这就需要提高警惕做进一步鉴别。至于通过一件青铜器之轻重来判别其真伪，则完全要依靠各人的手感经验，实无什么捷径或秘诀可以挪用。

三是，鉴别青铜器之纹饰款识。关于这一点，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中国古代青铜器分期断代的基本情况，比如人们惯常所说的夏商周三代铜器，由于夏代青铜器至今发现的都是一些小件实用生产工具，故此常常被考古学界划出圈外，而是从商代早期起始并延长至春秋战国乃至秦汉之物。对此，目前中国考古学界通常从时间概念上，将古代青铜器划分为：商代前期（二里岗期）、商代后期（殷墟期）、西周、春秋与战国这五大阶段，至于秦汉则归属为中国青铜器发展史上之余晖了。当然，还有中国文史泰斗郭沫若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从青铜艺术史角度之划分法——滥觞期、勃古期、开放期与新式期，以及瑞典人高本汉划分的古典式、中周式与淮式之分期法，只是前者至今仍被中国美学界所认可，后者则鲜少为国人采用。

不过，无论是从时间概念上还是艺术史方面来划分中国古代青铜器，它们的纹饰款识都有一定规律可循。比如，夏代青铜器纹饰多是反映当时人们纯朴审美意识之简单的三角纹或七角星图案；商代青铜器纹饰华丽繁缛、丰富多彩且往往布满器身，大致可以分为几何纹样、象生动物纹样与怪异动物纹样这三类；西周青铜器纹饰虽然基本上与商代相类，但是后期则逐渐趋向于素朴之风；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纹饰由原本粗放而一变为工细，而且充满了清新活泼的生活气息；秦汉青铜器纹饰由于人们更加注重器物的实用性而使之大为减少，如果镌刻有少许纹饰则更讲求精细了。另外，由于青铜器每个分期的纹饰图案有所侧重，人们还可以从不同时代纹饰之图案内容等方面加以比较辨识。

至于款识（而非铭文内容），主要是从字体发展变化方面来进行区别。比如，商代早期青铜器多无铭文只铸族徽类，一般情况下笔道刚劲而不作波磔，而商代晚期青铜器虽然有少数铭文，但是仍以铸刻氏族、祭祀者或作器者姓名为主，这类款识还没有完全脱离图形文字之形态，铸刻有少数铭文之字体则采用“画中肥而首尾出锋”的波磔体，这种字体规整遒劲、笔势洒脱大方、形态典雅秀丽。再比如，西周青铜器铭文比商代的有明显发展，铸刻有长篇铭文的器物层出不穷，单从中国书法艺术史这一角度来说，这一时期青铜器铭文之所以有“金文”“钟鼎文”之称，是因为它上承甲骨文下启篆、隶、楷，其工细典雅且锋露圆润的笔道，堪称中国书法艺术之杰作。还比如，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之铭文字体，不仅笔道有肥瘦之别，还出现了形似蝌蚪的“筮斗文”与仍具图案化的“鸟虫书”即所谓的“鸟篆”。另外，在战国晚期青铜器铭文中还出现了竖笔下垂且笔道末端尖锐之“悬篆”雏形字体，试想如果将铭文中出现这类字体的青铜器断为三代之器，就很显然是一则笑话了。

四是，识别青铜器之铜质器型。识别青铜器之铜质较为简便，只要翻看器足底部即可，若是黄铜则一眼便知，若是器足铜质作伪亦可用热碱水刷洗后而得其实质。至于不同时期青铜器有哪些器型，除了逐一对比铭记之外，则没有什么捷径可以凭借。比如，沿用时间最为长久的鼎，由于各个时期都有实物出土，从而可以通过比较鉴别得知，如果鼎上有盖，则不可能是夏商周三代之青铜鼎也。

以上管见，贻笑方家。

目录 contents

■ 绪论 /001	
■ 夏禹九鼎	
——青铜炊具 王权象征	001
■ 商后母戊鼎	
——国之重器 劫后余生	012
■ 商四羊方尊	
——世间百象 四羊有知	023
■ 商皿天全方罍	
——罍中之王 身首异处	033
■ 商虎食人卣	
——人虎相拥 匪夷所思	042
■ 商人面盃	
——商人模样 科学猜想	051
■ 商双凤重耳彝	
——人心不足 “双凤”飞去	059
■ 西周毛公鼎	
——庙堂之器 终藏圣殿	068

- 西周大孟鼎、大克鼎
——世代珍藏 一朝奉献089
- 西周小孟鼎
——同根宝器 湮没其一110
- 西周散氏盘
——百年蒙尘 慧眼识辨118
- 西周虢季子白盘
——乱世密藏 和平归公128
- 西周柶禁
——斗鸡台上 十三国宝141
- 西周凤纹卣
——凤翔九天 至今未归150
- 春秋浑源牺尊
——历经春秋 残梦难圆171
- 战国铜敦
——盗贼窃宝 刑警追讨186
- 元鎏金铜佛
——火速追踪 郎卡宁布198
- 明鎏金铜编钟
——韶乐妙音 中印合奏205
- 清圆明园海晏堂十二生肖青铜兽首
——惨遭劫掠 坎坷归来213
- 清颐和园宝云阁铜窗
——回归之“窗” 友人开启227

夏禹九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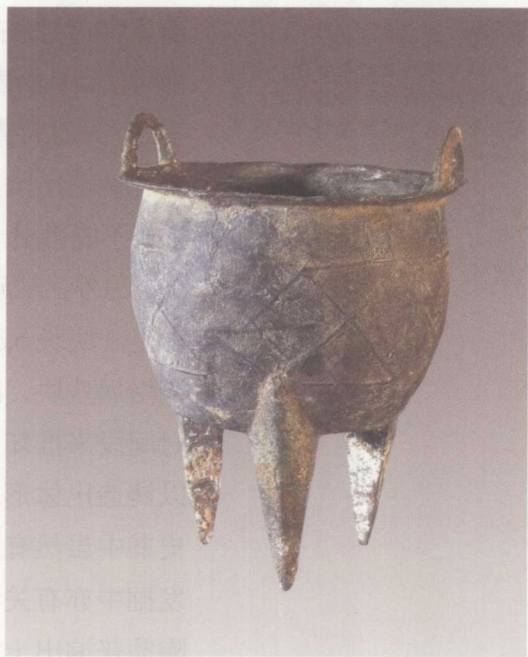
——青铜炊具 王权象征

不知始于何时，历史文物在人们意识中竟成为枯燥刻板的代名词，其实不仅不然，而且还充满趣味，比如原本只是古人烧煮食物的青铜器物——鼎，特别是夏禹所铸九鼎，后来怎么就演变为国家政权的一种象征了呢？

其实，在人们潜意识中还有一种误解，那就是普遍认为夏禹九鼎是“鼎”这种器物之鼻祖。而司马迁却在《史记·封禅书》中有“黄帝作宝鼎，象天地人”的文字记载，即表明“鼎”不仅早在夏禹的高祖

父黄帝时就已经出现，而且还成为夏禹“铸九鼎，象九州”这一行为之滥觞。那么，黄帝所作“宝鼎”是否与夏禹所铸“九鼎”一样属于青铜鼎呢？

关于这一点，最顺理成章的追问应该是中国青铜发展史上限是否到达了黄帝时代，或者直接质



网格纹鼎

夏代制作，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高20厘米，口径15.3厘米，敛口、折沿、环耳，空心四棱锥状足，腹饰一周带状网格纹，是迄今所见时代最早的铜鼎。



青铜刀

马家窑文化时期制作，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长 12.5 厘米，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件青铜器。

问：黄帝时代是否已经发明了青铜材质并具备铸造青铜鼎这类器物之工艺技术？

考古资料证明，目前中国最古老的青铜器，是出土于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中的一件单范铸造之青铜刀，而马家窑文化遗址相对应的年代为

前 3000 年左右，也就是母系氏族社会中晚期的黄帝时代，从而表明黄帝时代已经发明了青铜材质。不过，从这件青铜刀单范铸造之工艺技术上来看，要想铸造出比其绝对复杂之合范青铜鼎的话，恐怕还不能得出一个让人比较信服的结论来。

另外，从河南临汝煤山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址中出土一块长 5.3 厘米、宽 4.1 厘米、厚 2 厘米的炼铜坩埚残块，以及龙山文化相当于尧舜时代这一时间段来推知，早于尧舜时代之黄帝时代恐怕难以铸造出体形大、工艺复杂之青铜鼎。再者，在史书中虽然有夏禹铸九鼎之文字记载，但是考古发掘中亦有关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之陶鼎普遍出土的现象，这至少表明青铜鼎与陶鼎在夏代是共同存在的，而从青铜器起源或脱胎于陶器这一被史料与考古发掘所证实方面来看，比公元前 2070 年夏启立国早近千年的黄帝时代，要想铸造出对材质与工艺等方面都有很高要求的青铜鼎实在是一件极其难为之事，或者说黄帝时代